

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抗战

□李倩 刘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民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长达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自始至终贯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进一步发掘与研究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十四年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对深入了解党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及伟大贡献,进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战大旗,肩负起东北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当局一面指示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寄希望于荒谬的“国际公理之判断”,“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致使东北陷于危机之中。在这一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起武装抗战大旗,最早发出全民族抗战的决议与号召。同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革命委员会发表了《满洲事变宣言》。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政府连续发表宣言或告全国民众书,强烈谴责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对日斗争的策略和武装抗日的号召。

与此同时,处于抗日斗争最前线的东北党组织迅速做出了判断与决策。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首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发出了坚决抗日的正

式宣言,强调:“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是真正反对帝国自己的力量……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政府(苏维埃政府)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府。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并相继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与《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由此,中共中央与东北地方党组织通过一系列宣言、指示和决议,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指明了方向,进而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

此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组建及其武装反日斗争的开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一系列纲领策略和政策指示,以加强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同时,中共中央派出一批党员和团员,特别是赵尚志、杨靖宇、周保中、王德泰等得力干部,他们“共赴国难,分途努力,因应客观环境,采取稳健步骤,渐渐发生核心的作用”(《中国全面抗战的展开》,《文汇报》1939年5月号,第67页),一方面领导或协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展开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加强了对东北游击队组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力量。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东北抗日统一战线,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具有借鉴与促进作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华民族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从统一战线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东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及形成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最早的贯彻与实践探索。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指出要“尽量同下层小

资产阶级群众,如像一部分革命学生,小商人,以至城市贫民成立反帝的统一战线,并且成立这种反帝的公开组织,而取得其领导”(《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7册,第412页)。根据东北抗日形势的变化与发展,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指出要“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组织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东北地区建立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对东北武装抗日斗争战略策略的转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进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

中共东北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建立起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游击运动,对敌进行联合作战。自1931年11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从事艰苦的抗日武装创建工作。如童长荣被派往东满任特委书记,以加强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延吉、汪清、安图各县先后建立起游击队,后又合编为东满游击队,进行联合作战,并建立起东满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4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将杨林、杨靖宇派往磐石、海龙等地,整顿党组织和游击队,指导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整编和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南满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于1933年1月至5月间,与敌人作战60多次,粉碎了敌人四次“讨伐”。1933年1月,杨靖宇又将海龙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同年秋天,该游击队与南满游击队会合,其后更吸收了多支义勇军,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和中心力量。同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分别派周保中到吉东地区,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到北满地区或创建、改编游击队伍,开辟抗日游击区,

不流于形式,脱离实际。同时,必须找准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才能实现宣传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良性互动。

注重农村宣传方式方法本土化的探索创新

宣传方式方法的本土化创新是宣传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1925年恽代英就指出,宣传者“要知道宣传人的生活,从他的生活中找你说话的材料,找那些可以证明你所讲理由的例子,而且利用他生活中常要听见的土话或其他流行的术语说明你的意思”(《中国青年》1925年7月25日,第84期)。1939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强调,“应该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下册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宣传方式方法本土化的探索创新得以进一步发展。山西晋阳县甲等模范宣传员李贵元利用农民对戏剧的热爱,编写了“三封信”剧本,向民众宣传爱国公约。昔阳有70多个剧团,都出演了“三封信”,大约全县有70%的群众都看过这个剧,大大推动了爱国公约群众大会上通过了全村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公约,使抗美援朝教育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运城地委建立宣传网的经验及今后普遍建立的意见》,《山西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3版)。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例都说明,宣传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来做,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3年初,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东北党组织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已经建立起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到1935年末,东北形成了8个抗日游击区,约15处游击根据地,覆盖东北五十余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发挥了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延缓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进程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东北军民所开展的抗日游击斗争在中华民族整个抗战进程中发挥了独当一面的战略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协助和支持下,东北抗日义勇军主动出击,除有选择地袭击作为日伪统治和进行经济掠夺基础设施的铁路交通线外,还不断攻击城镇中的日伪据点等,使日伪方面多次处于被动局面,给予其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在党的政策策略指导下,中共满洲省委、执行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建立起武装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扩大游击运动,对敌进行联合作战。自1931年11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从事艰苦的抗日武装创建工作。如童长荣被派往东满任特委书记,以加强组织和领导抗日斗争。延吉、汪清、安图各县先后建立起游击队,后又合编为东满游击队,进行联合作战,并建立起东满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4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将杨林、杨靖宇派往磐石、海龙等地,整顿党组织和游击队,指导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同时,将磐石工农义勇军整编和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南满游击队。这支游击队于1933年1月至5月间,与敌人作战60多次,粉碎了敌人四次“讨伐”。1933年1月,杨靖宇又将海龙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同年秋天,该游击队与南满游击队会合,其后更吸收了多支义勇军,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和中心力量。同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分别派周保中到吉东地区,赵尚志、冯仲云等人到北满地区或创建、改编游击队伍,开辟抗日游击区,

在东北党组织的号召下,为有效牵制日军入关,支援关内抗战,各抗日联军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斗。吉林依兰抗日第八、第九联军于1937年9月20日起与日军石川部队连日激战,使日军伤亡惨重。10月,吉林东部边境饶河县,杨靖宇率部与来犯日军激战,击毙日军旅团长野武少将及多名中军官。辽宁东部,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斗争,使日军疲于奔命。此外,日军的军事和基础设施不断被毁,中心台煤矿被焚,沈阳城外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先后被炸毁……抗日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破坏日军后方的兵站、仓库、运输与通信。至1938年,东三省各地抗日联军纷纷向日军发起总攻或进行激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这一时期,各地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已有默契的配合和联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战积极配合全国抗战,消耗并牵制日军入关

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进而使东北抗战的战略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大举进攻,将中国东北作为其重要后方基地,关内则成为其侵华战争的主要战场。自此,中国共产党组织与领导下的东北战区由单独作战转变为全民族抗战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国抗日救国大形势的推动下,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许多可敬可

叹、可歌可泣的战绩与功勋。

在东北党组织的号召下,为有效牵制日军入关,支援关内抗战,各抗日联军对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斗。吉林依兰抗日第八、第九联军于1937年9月20日起与日军石川部队连日激战,使日军伤亡惨重。10月,吉林东部边境饶河县,杨靖宇率部与来犯日军激战,击毙日军旅团长野武少将及多名中军官。辽宁东部,东北抗日联军艰苦斗争,使日军疲于奔命。此外,日军的军事和基础设施不断被毁,中心台煤矿被焚,沈阳城外飞机场和飞机制造厂先后被炸毁……抗日联军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破坏日军后方的兵站、仓库、运输与通信。至1938年,东三省各地抗日联军纷纷向日军发起总攻或进行激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这一时期,各地东北抗日联军在军事上已有默契的配合和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日军指挥部不断增加兵力来镇压东北的游击运动。据统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投入总兵力不足两万,至1933年增至4万余人,1937年日本陆军军力有40万人,1938年增至50万人,1939年则达70万人,而且这些数字尚未包括伪军在內。在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部队,歼灭日伪兵力,扰乱日军后方,使日本在一定时期内不能集中力量入侵中国关内,反而要继续向东北增兵,有效地牵制了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终的完全胜利付出了极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十四年抗日斗争,为中国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向最终的完全胜利付出了极大牺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东北民众抗日斗争得以长期坚持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东北十四年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作者分别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抗联档案文献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16ZDA136)阶段性成果)

员的宣传能力(《磐石支部坚持上课制度,提高了宣传员工作能力》,《山西日报》1953年1月22日,第4版)。

定期召开宣传员会议,解决宣传员面临的实际问题。长治县漳寨村党支部确立专门制度,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召开宣传员会议,主要议题为汇报工作、交流经验、研究群众意见、学习材料、布置新任务等。壶关十里村党支部规定7天召开一次宣传员会议,组织宣传员交流工作经验、讨论与解答群众的疑难问题,并布置下一周宣传任务(《壶关十里村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员的》,《山西日报》1951年5月9日,第3版)。

检查总结宣传工作,不断提高宣传员的宣传能力。检查总结工作能够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也能够总结经验工作中的好的做法等,提升工作以提高他们的质量”(《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111-112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宣传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加强学习培训,提升队伍素养。山西把学习培训作为培养农村宣传人才的有力举措不断得以实践推广。1951年长治县委围绕时事政治、宣传鼓动工作的经验和内容开办宣传员训练班,涉及125个村庄,使大家一致认为“要加强宣传工作,首先应该把宣传员自己武装起来”(《县区党委如何领导宣传网,长治县委开办宣传员训练班介绍》,《山西日报》1951年5月15日,第3版)。阳高县二区整石村党支部针对对本村“大部分宣传员文化水平低,接受宣传要点有困难”问题,规定“每逢初一、十一、二十一,给宣传员上课,每次两个小时,一小时讲,一小时讨论”,学习制度大大提升了宣传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品读西柏坡》序

□陈晋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西农村地区党的宣传工作及其经验

□樊艳丽 刘荣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在长期实践中,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认真总结、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畅通有效的宣传网络,以使群众了解与认同国家方针政策,并整合与凝聚群众力量,成为时局发展的当务之急。这一时期,山西在推动党的农村宣传工作中做了一些探索,取得较好效果,其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坚持村党支部等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尤其是村党支部的领导是农村宣传工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做好宣传工作又增强了基层党组织宣传网的凝聚力号召力,推动了农村工作的开展。如山西祁县王村过去的工作曾是“很不好”的,其“首要原因是村党支部不注重领导宣传网工作”,后由于“党支部特别注意了宣传网工作的领导”,因而各项任务完成的成就比以前顺利多了(《王村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网工作的》,《山西日报》1952年12月13日,第4版)。与王村一样,山西各地在开展宣传工作中,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宣传工作的领导。

首先,严把宣传员的“入口关”。宣传员的选拔直接影响宣传工作的成效。山西农村党支部在选拔宣传员时探索出多

种办法。如临汾县,先训练大批积极分子,从中吸收有宣传能力、思想进步、工作热情的人组成临时宣传小组,并根据个人特长分配具体任务,经过实际锻炼,采取自觉自愿、党支部审批通过、区委批准的方法吸收宣传员。昔阳巴洲村等同样采取自愿报名和支部提名、本人同意、党员大会审查、工作组出具意见、区委最后批准的方式选拔审查宣传员。

其次,筑牢宣传员的“思想关”。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乡村宣传员对宣传工作缺乏信心,甚至认为宣传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此,乡村党支部定期对宣传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教育。如平陆县古王村党支部每半个月对宣传员的思想情况分析一次。该村宣传员史宝山只顾牺牲口搞运输,对宣传工作消极疲沓。支部开展思想工作使他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此后表现很积极(《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宣传网的》,《山西日报》1952年12月6日,第4版)。壶关县河西村党支部定期对宣传员思想进行分析,如1952年6月该村一些宣传员对爱国增产运动没信心,党支部以劳动模范王老肥的实例进行教育说服后,宣传员都主动检讨了保守思想,宣传员王老松说:“应该好好向丰产模范学习……生产上的奔头大理,好好干吧。”(《河西村党支部领导宣传网工作的三个法宝》,《山西日报》1952年6月14日,第4版)

再次,严守宣传内容的“管控关”。1951年刘少奇在《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一文中曾指出:“宣传什么,如何宣传,要按照当

时当地的情况决定,不仅是由宣传部决定,还必须取得党委的同意。”这也成为山西农村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各农村党支部在对宣传内容的把关中不断探索出自己的方法。如忻县田家窑村是先开支部会,研究宣传内容,提出简明口号,然后由编辑组整理出来,经支部传达给各个宣传员和群众宣传组织。同时支部规定了每件宣传工作都需支部先研究,然后开人民代表会和宣传员会,形成统一决定后再行宣传(《中共忻县田家窑支部宣传网工作有创造》,《山西日报》1951年11月13日,第3版)。

围绕农村中心工作开展宣传

宣传工作不能离开当前的中心工作,并且应保证各项中心工作的完成,离开了中心工作,宣传工作就会失败(刘少奇:《党在宣传战线上的任务》)。山西农村在推进宣传工作中,把宣传工作和农村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实现了二者良性互动。如晋阳县巴洲村宣传员以修好汽路是抗美援朝的口号向群众大力宣传,大家情绪高涨,原计划三天完工的修路工作,一天内就完成了。河津县修仁村在召开抗美援朝群众大会上通过了全村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公约,使抗美援朝教育与实际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运城地委建立宣传网的经验及今后普遍建立的意见》,《山西日报》1951年4月13日,第3版)。这一时期的诸多事例都说明,宣传工作只有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来做,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员

党史
理论部主办
电话:67078942